

四、蒋汪背叛与大革命的失败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和民众的觉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方面感受到了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威胁，另一方面急于抢夺胜利成果建立独裁统治，大革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早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就蓄谋破坏国共合作。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和黄埔军官学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窃取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

面对着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当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说：“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会议根据报告所作的议决案认为：“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说，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但决议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巨烈向右转的蒋介石势力；它在实际上所强调的，只是防止民众运动的所谓“日渐向‘左’”，也就是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

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离开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仅

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难以克服。所以，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这个方针为1926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苏联代表鲍罗廷联席会议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所肯定，开始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并逐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借进行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2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机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可是，这次大会没有能满足全党的期望。大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民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这些主张都是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的。

大会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这在以后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它又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好像这是很可靠的联盟，这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且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觉，不去做好相应的准备。大会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革命原则，是正确的；但又提出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限制，并且强调没收地主土地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是先取得汪精卫等的同意，这又使这个主张成为一句无法实行的空话。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对这个问题连谈也没有谈。在局势如此危迫、全党正期待着采取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时，大会却大谈中国应立即准备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即“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更是不切实际的。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这一错误。大会也未选举产生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陈独秀仍然担任总书记。从总体上来看，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而是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5月17日，原驻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

纸坊。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6月6日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

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者不仅不作任何事变的准备，反而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甚至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把武装交给国民党。企图以无原则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反而更加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明初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随后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建议都被中共中央所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将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同一天，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7月14日，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

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正指出，党内领袖不能贯彻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告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后期才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所出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

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这对酿成陈独秀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